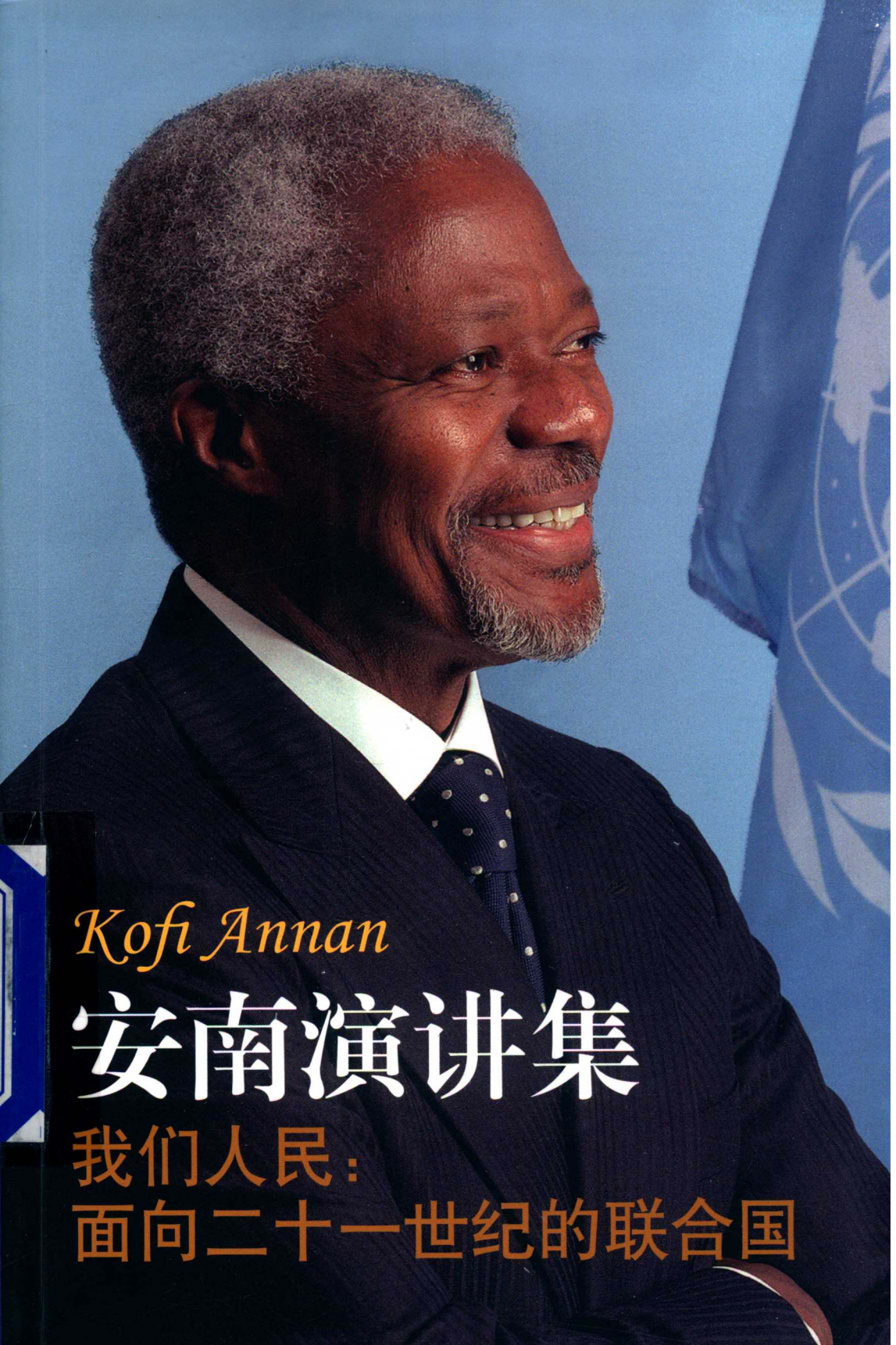


A portrait of Kofi Annan, an elderly Black man with grey hair and a goatee, smiling and looking to the right. He is wearing a dark blue pinstripe suit, a white shirt, and a dark blue tie with white polka dots.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blue color with a faint, larger-scale patter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mblem on the right side.

Kofi Annan

安南演讲集

我们人民：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联合国

安南演讲集

我们人民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联合国

科菲·安南 著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人民：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联合国：安南演讲集 / (加纳) 安南著；

赵莉妍等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

ISBN 978-7-119-09428-1

I. ①我 ... II. ①安 ... ②赵 ... III. ①安南, K.A. —演讲—文集 IV. ① K834.4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429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2636 号

原出版者书号：978-1-61205-558-9

Copyright © 2014 Paradigm Publishers.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Paradigm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名：We the Peoples: A UN for the 21st Century, 原出版者 Paradigm Publishers,

经授权中文版由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全世界独家出版发行。

“A Girl Born Today in Afghanistan” appearing in Chapter 1: Copyright © The Nobel Foundation (2001).

Source: Nobelprize.org.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本书第一章中的“一个今天出生在阿富汗的女孩”，版权归诺贝尔基金会所有 [Copyright © The Nobel Foundation (2001)], 经授权出版。

总 策 划：周明伟

协调统筹：徐 步

责任编辑：许 荣 冯 鑫

翻 译：付 蕾 姜晓宁 赵莉妍 赵萍萍 等

审 定：许 荣 徐明强 孙 雷 李 洋 等

印刷监制：冯 浩

安南演讲集

我们人民：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联合国

科菲·安南著，爱德华·莫迪默编

出 版 人：徐 步

出版发行：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中国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网 址：<http://www.flp.com.cn> 邮箱：flp@cipg.org.cn

电 话：(010) 68995844/68995852 (发行部)

(010) 68327750/68996164 (版权部)

印 制：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718mm × 1000mm 1/16

印 张：22.5

版 次：201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19-09428-1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68995852)

前 言

人们期待联合国秘书长扮演几种不同的角色。《联合国宪章》的定义是“秘书长为本组织之行政首长”（第97条），并要求其“向大会提送关于本组织工作之常年报告”（第98条）。但是，《联合国宪章》也允许秘书长“将其所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第99条）——这显然是一项政治责任。实践中，人们常常呼吁秘书长利用其“影响力”，通过平稳的外交方式解决或处理争端。此外，会员国常常希望秘书长就程序事宜提供指导方针；有时，也希望他在实质性问题上牵头，帮助各方达成共同立场。

然而，秘书长也是个公众人物。人们期待他在全世界面前代表联合国以及联合国的原则与理念。1945年12月23日，在首任秘书长被任命的数周之前，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曾写下这般期待：“如果没有世界各国人民积极、忠实的支持，联合国便无法繁荣发展，目标也不能实现……秘书长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代表整个联合国。联合国寻求《宪章》发挥作用，而秘书长必须体现《宪章》的原则与精神，这不仅是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观点，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期望。”

在联合国成立之初，这只是秘书长工作中的一小部分。联合国首任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将联合国的总部地址设在

纽约——他说服了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¹将位于东河边的一块地捐给联合国，并聚集了优秀的设计师团队来设计联合国大楼；人们因此而记住他，而不是他的任何演说。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²首先发现，他可以效仿西奥多·罗斯福利用其美国总统之职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利用联合国秘书长职位来影响民意，为自己争取空间，抵御来自强势会员国的压力。哈马舍尔德曾做过一些非常精彩的演说，特别是在牛津的演说——“法律和现实中的国际公务员”。我在“达格·哈马舍尔德系列讲座”，也就是本书的第一篇演讲中对此也有所提及。但是，他必须十分谨慎地斟字酌句、确定主题，巧妙地在冷战背景下的有限的范围内行事。他逝世后，三位在冷战期间任职的秘书长也受到了类似的束缚。

我在1996年年底受命之际，世界发生了几乎翻天覆地的变化：冷战结束，安理会不再陷于永久的、结构性的僵局之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会员国能够或者愿意在任何问题上采取有效的行动路线达成一致；我们很快便在索马里、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痛苦地证实了这一点。但这的确意味着联合国官员可以为《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宣言》确定的一些原则发声，而且听起来确有诚意，不会因此而激怒常任理事

1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创始人，美孚石油公司（标准石油）创办人，是世界公认的“石油大王”。——译者注

2 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1961年9月18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从事和平任务时因飞机失事殉难。1961年获追授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国，或引发产生可能击垮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危机。

此外，世界在其他方面发生了或许更为重要的变化。我们开始掀起通讯革命，这赋予了“公众人物”全新的含义。任何事件、评论都可能迅速传遍世界；而世人眼中代表联合国的那个人，必须迅速做出回应。一言不发本身就是一种回应，但这种回应往往并非良策。我发现自己就一直这样被置于媒体的聚光灯下，无论喜欢与否。

这是一种负担，但是我很快认识到，这也是一种机会。我相当清楚，我没有任何“硬实力”——没有装甲师、轰炸机、战舰听从我的指挥，在危急关头可以快速部署。但是，根据约瑟夫·奈³的说法，我的确有些“软实力”。一种叫作世界民意的东西是有可能存在的，不再是空想。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广播和电视，更多地通过手机或电脑，“实时”地追踪同一事件的进展。他们开始意识到，某些问题，如地方性贫困、传染病、气候变化、人口增长、毒品、有组织犯罪、移民、能源和食物供给等，已经超越了国界，也不可能通过任何一国之力解决。人们看到了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并将希望寄托于联合国。虽然对联合国的历史或运作方式知之不多，但是人们认为，联合国应当令各国团结合作，为全球性问题寻求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换言之，有了全球性议程，也有了全球的公众，但是

3 约瑟夫·奈（Joseph Nye），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他所说的“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译者注

必须有人清楚地说明这一议程，将其传达给全球公众。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胜任此项任务，他必须拥有各国政府认可的地位，具有为全人类发言的权威。如果不是联合国秘书长的话，又能是谁呢？

这个想法听上去可能相当狂妄，可我觉得，胸怀壮志不会给我带来任何损失。这是时代的需要。从另一方面说，时机也适宜；这看上去似乎无关紧要，但我认为，从心理角度上讲这非常重要。我于1996年被任命，任期5年，因此任期跨越了2000年。在我看来，此时有件全世界人民都会关注的事情即将发生，而且真正千载难逢，这就是——一个千年即将结束，新的千年即将开启。如果有那么一个时刻，世界各国人民愿意共同思考境遇、衡量收获、为将来设立目标，那么，必定是此刻。而只有通过联合国，这样的集体思考和目标行动才有可能发生。必须有人来牵头推动，而此人非联合国秘书长莫属。

所以我建议：2000年9月第55届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应当成为“千年首脑会议”的盛典，各会员国领导人应当尽可能出席。大会同意由我提议“若干紧密相关的前瞻性议题，以吸引大家在总主题背景下关注千年首脑会议”。这就是我《千年报告》的起源。该报告最后还包括一份草拟的声明“供首脑会议考虑”，后来形成了首脑会议所签署的《千年宣言》的基础，包括其后诞生的“千年发展目标”——可令全球在2015年实现的一系列简易、可量化目标，其中包括极端贫困程度减半，普及基础教育，抑制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

这些事情令我确信，公众活动、公众话语将成为我工作

的重要内容——与前几任秘书长相比，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或许更加重要。我需要提议、倡导一些优秀的思想，并使用清晰的语言，让不熟悉联合国的公众知晓、理解，因此我十分重视我的演讲和其他公开声明。在最初的4年里，我的战略顾问约翰·鲁杰以及演讲撰稿人团队对我帮助很大。在他们看来，我最重要的指导方针就是：“绝不用联合国的说话方式面向世界演讲！”

当然，所有这些演讲都是针对特定时间、特定场合的，勤勉的研究者知道从哪里以及如何找到这些材料。在本书中，我选编了一小部分我认为可能值得广大读者了解的内容，即便是发表在十几年甚至更久以前的演讲。

我曾在2012年出版的书中描述过我的秘书长任职生涯⁴，本书将对此予以补充，列举一些我在任职期间针对不同对象、不同主题的讲话内容。本书分为9章，演讲稿按时间顺序编入各章。

第一章讲述的是联合国自身：这一处理全球事务的机构，珍贵却不完美。我们从前辈手中继承下这一机构，必须得到最充分的运用；而且，要在10年的巨变、压力和机遇中摸索前行，这一责任落到我的身上。本章包括我于2001年在奥斯陆发表的获奖演说，当时我和联合国因“为建设一个更有组织性、更和平的世界所作出的努力”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4 《安南回忆录——干预：战争与和平中的一生》，科菲·安南、纳德·穆萨维扎德合著，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接下来的第二章讨论的是发展、经济和民间社会。这些主题，我认为是我任职期间的重中之重。对于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们而言，发展看似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发展却是全球性问题：发展的成败，将决定他们和他们的孩子是否有望过上体面的生活。自然地，他们会通过联合国对全球发展是否做出贡献来评判联合国。但有一点我必须说明，发展取决于经济因素和各项政策，这些因素联合国影响甚微，更谈不上控制。当然，我依然毫无疑问地是个倡导者——倡导富国向穷国提供更慷慨的发展援助，在贸易、金融和投资领域采取更公平的规则，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更好地代表发展中国家。但我必须再三强调：发展只能在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实现，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的国情及其本国政府采取的政策；如果不能赋予妇女和女童权利（她们是半边天，拥有人类至少一半的潜力），不能令其在所有的社会活动中充分发挥包括领导力在内的作用，发展便不可能实现；如果发展损害到了我们的星球和生态系统而不可持续，那么，这样的发展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是毫无用处的。

除按照惯例经营与各国政府的关系外，我还须呼吁更多的伙伴来与作为主权国家联盟的联合国开展合作。其中一个合作伙伴是商业团体，针对它们我于1999年提出了“全球契约”计划。但同样重要的是民间社会——人们自愿地走到一起，结成各种地方性、全国性或国际性团体，从不同的方面共同推动人类进步。我确信，除非联合国主动与这些团体接触，说服他们相信联合国是有用的盟友，能够并愿意与

他们合作，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否则，联合国在21世纪将难有作为。正因如此，我一直提醒世人，《联合国宪章》不是以“我们各国”而是以“我们各国人民”的名义颁布的；我也因此选择用“我们人民”作为我的《千年报告》及本书的标题。

第三章讲述的是安全与和平，这是世界各国人民赋予联合国的首要任务：“欲免后世再遭战祸”。为了保护人类生命和寻求发展，安全与和平是如此的重要。在许多地方，冲突是影响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因此我认为，预防冲突与寻求发展同等重要，两者密不可分。就在我成为卡耐基预防致命冲突问题委员会（会长为大卫·汉博格⁵和赛勒斯·万斯⁶）的秘书长之后不久，委员会便针对这一问题制定了突破性的最终报告，这对我极有帮助。

我赞同这份报告，并尝试将其中很多想法应用于联合国的实际工作。当然，我也必须应对任职期间爆发的重大战争危机：如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些促使我着力解决新世纪国际秩序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如何实现集体决策而非单方面行动，特别是在武力使用问题上；如何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如何处理核武器问题，不仅要防止其进一步蔓延，还要朝着裁军方向前进。

除了“发展”及“和平与安全”这两个主题外，还有第

5 大卫·汉博格（David Hamburg），纽约卡耐基公司名誉主席。

6 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美国政府官员，曾任吉米·卡特政府的国务卿，致力于促成限制武器条约。1992年担任联合国波黑冲突调解人。——译者注

三个主题，《联合国宪章》将其放在“防止战争”之后，那就是“基本人权”，这同时也是第四章的主题。对联合国而言，这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作为主权国家的联盟，联合国必须说服其会员国维护人权，即使这些会员国中就有人权的主要违反者。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坚信，这个问题是联合国无法回避的。

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一堆事实或数字，它们关乎人类个体的命运。因此，只有个人及其权利受到法治的保护，不受专断权力的摆布，我们才能真正地实现和平与发展。事实上，大量研究表明，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是预示该国即将陷入冲突的最可靠指标之一。这意味着，除非人们有能力组织起来，通过和平的辩论或抗议主张自身权利，否则，无论和平还是发展都没有保障。因此，2005年我在《大自由》⁷报告中首次提出，人权是联合国的“第三支柱”，因此除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外，我们需要有关于人权的理事会。在我目前的工作中，仍然有人权主题的相关内容，而且非常重要，正因如此，我在本书中收录了一份我离任后的演讲，以纪念人权运动的首次重要胜利——1807年英国议会取消奴隶贸易——200周年的演讲。

联合国为预防冲突做出的最具创新性的贡献，是发明了维和概念，即中立的轻装部队可以介入对立双方，使双方相信

7 联合国大会，《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 and 人权》（In Larger Freedom: Towards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for All），秘书长报告，2005年3月21日，A/59/2005。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59/2005。

另外一方无法发动突袭，从而帮助维持休战状态。几十年来，这一职责已经扩大，维和人员已成为和平的建设者：由国际社会派出的第三方人员帮助该地区从冲突中恢复，并过渡到持久的和平。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前，我有幸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的首任主管。所以很自然地，我希望将两篇讲述维和行动以及我们从中收获的经验的演讲收入本书，放在第五章。

接下来两章关注的是世界几个特殊地区，这些地方充满了不幸，在联合国安全议程的安排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也会花费每届秘书长大量的时间。这些地区中，第一个是我生长的非洲大陆，有关内容安排在第六章。非洲经常以需要帮助的、贫穷受害者的形象呈现在世界面前——因冲突而四分五裂，迫切地需要援助。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我们读到更多的是——非洲大陆充满机遇，快速成长。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都奇迹般地消失了，但确实反映了在过去的大约20年里，非洲人民迎难而上，愿意做出一些艰难的抉择。

我很高兴地记得，作为来自非洲的第二任联合国秘书长（也是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首位秘书长），我总感到有责任向非洲国家领导人开诚布公，说出普通非洲人民的忧虑，特别是对艾滋病毒/艾滋病蔓延的担忧。在我的有生之年里，这可能是非洲大陆不得不应对的最大悲剧。在本书中，我也收录了一篇离任后不久的演讲，那是在庆祝我的祖国独立50周年庆典上的讲话，我可以借此总结在非洲发生的一些变化，也让我有理由对她的未来充满希望。

占据联合国大量时间和精力另一个地区，当然是中

东，这便是第七章的主题。我在本书中主要是指阿以冲突，而不是伊拉克和整个中东地区的问题。有一点我不得不再三重申，那就是和其他任何冲突相比，这个冲突更能引起外部人士甚至全世界人民的注意。

自从联合国成立伊始，“巴勒斯坦问题”便是困扰它的一大问题。以色列根据1947年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决议获得国际合法性，该决议授权将当时托管于英国的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分割，建立一个阿拉伯国，一个犹太国。1956年联合国的第一支维和部队就部署在以埃边境，而今天在以黎和以叙边境，联合国仍然保留有武装力量。总部设在耶路撒冷、历史可以追溯到1948年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以及重要的人道主义行动——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仍在维持运作。然而，当我成为秘书长后，联合国事实上已经无法开展政治努力，解决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冲突，因为以色列认为联合国是敌对的。这在我看来是错误的，我也尽我一切所能去改变。以色列于2000年从黎巴嫩撤军，我们确实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02年起，我们还通过“中东问题四方会谈”⁸参与了所有的和平行动，我真希望这些努力可以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第八章是关于一个特定的问题——防止灭绝种族。我对此深有感受。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妻子娜内是拉乌尔·瓦伦贝格的侄女。拉乌尔是一位英勇的瑞典外交官，从纳粹死亡集

8 在此期间，作为鼓励和引导巴以和平进程的“会谈四方”，联合国、美国、欧盟和俄罗斯联邦四方定期举行会晤。

中营里救下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但主要还是因为，在我担任联合国维和行动主管期间，联合国未能阻止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和1995年波斯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我必须对此负责。

我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地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作为秘书长，我大力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以确保未来可以将这种罪行绳之以法。我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报告⁹，指出“由于错误、误判和无法识别我们面对罪恶的范围，我们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没能在大规模屠杀塞族行动中帮助拯救斯雷布雷尼察人”；我委托开展的一份独立报告¹⁰发现，“在卢旺达大屠杀之前及其期间，联合国最重大的失败可以总结为：缺乏资源且缺乏承担义务的意愿，而这本来是预防或制止这次种族灭绝所必需的。”作为回应，为预防今后再次出现种族灭绝事件，我制定了一份联合国行动计划，并于200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10周年之际在人权委员会宣布。1999年，我说服了印尼总统哈比比撤军并允许一支国际部队进入，以防止在东帝汶发生进一步的流血事件；后来，我恳请会员国在处理达尔富尔和其他地区的暴行时采取更强硬的路线。2005年，我还说服联合国大会，纪念60年前在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种族灭绝——纳粹大屠杀——中遇难的人们。

9 根据联合国大会第53/55号决议的秘书长报告，题为《斯雷布雷尼察的陨落》（The Fall of Srebrenica），A/54/549，1999年11月15日。

10 《联合国在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暴行期间的行动的独立调查报告》（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the Ac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during the 1994 Genocide in Rwanda），联合国文件S/1999/1257，1999年12月16日。

最重要的是，我努力推进人道主义干预：在极端情况下，任何有能力去干预、制止种族灭绝或大规模屠杀的人都应这样做。对联合国而言，这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因为它可能涉及干预会员国“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而这是《联合国宪章》所明文禁止干预的（第二条第七款）。但是，同款也规定，“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这里指的是当存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时，安理会要采取的措施。我认为，主权蕴涵着一个国家有责任保护其公民免受极端行为之危害，而当一个国家明显无法做到这点时，安理会便可能需要进行干预。

这就是后来为人所知的“保护责任”理论。在公众的记忆中，这大概是与我最密切相关的问题。这可能让一些人感到我喜欢军事干预，并随时准备支持这种做法。而我的回忆录书名中的“干预”一词，甚至也有可能加深了这种印象。但是，读过这本书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正如本书中“论干预”这篇演讲所解释的，我相信干预可以有多种形式，绝大多数干预措施是完全和平的，而且但凡有选择，非暴力手段总是首选。

在极少数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便是两害取其轻，而这往往意味着更早、更好地避免流血的机会已经错过。预防胜于治疗。在启用军事干预的“激进疗法”之前，人们必须非常肯定这不会使情势恶化。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过去的两年中，我认为不应鼓励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尽管其人民已经遭遇了很多暴行。

种族灭绝涉及一群人类企图消灭另一群人类，而这几乎

都是因为前者令自己相信，另一群人类对他们的生存构成了威胁。杀戮他人，是为了不被他人杀戮。我认为，这种将差异视为威胁的看法源于世间众多的邪恶。如果说联合国有什么特点的话，我认为那一定是对差异的颂扬，是说服人们相信：多样化是值得鼓励的，是财富、乐趣和知识的来源，不应作为恐惧和危险的根源被回避。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我收录了一些语句，用来说明这一观点。

总体而言，我仍然深信，联合国不仅属于其会员国的政府，最重要的是，它属于以其名义成立的各国人民。这意味着，联合国必须更加民主，确保世界上所有的人民——而不仅是最有财有势的那些人——都有发言权，确保决策者真正代表其人民并向他们负责。各国人民必须坚持将联合国这一宝贵的工具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他们才能共同地面对挑战，把握21世纪的机遇。

我希望本书的一些想法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点。



科菲·安南

2013年于日内瓦

目 录

前言	I
第一章 联合国	1
· 达格·哈马舍尔德留给我们的财富	3
· 一个今天出生在阿富汗的女孩	13
· 无法愈合的创伤：我们在伊拉克殉职的同事	21
· 把巨石推向山顶	29
· 五条经验	36
第二章 发展与全球共同体	45
· 民间社会的力量在崛起	47
· 创建与商界的全球契约	55
· 和平与发展	60
· 全球的市场，全球的价值观	69
· 我们人民	75
· 领导力正在从女性中产生	82
· 气候变化：全方位的威胁	87
第三章 和平与安全	91
· 预防致命冲突	93
· 武力的使用	98